

1980年代初遵义会议相关历史问题调查考辨

王怀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西城 100009)

【摘要】为澄清相关史实,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对遵义会议进行了专门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此次调查于1981年初启动,共经过三个阶段。在起步阶段,调查人员经过查阅档案、实地调研、访谈当事人等,形成了调查报告初稿,并内部发行。调查过程同时也是史料收集过程,特别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陈云手稿成为此次调查的重要依据,解开了会议的诸多谜团。在深化阶段,调查组进一步深入研究,对调查报告初稿进行了完善与修改,使相关史实更加准确。在完成阶段,调查报告连同相关文献公开出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遵义会议;调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陈云手稿

【中图分类号】D231;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23)04-0091-14

DOI:10.16223/j.cnki.cn61-1456/c.2023.04.004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6}。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遵义会议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会议召开细节、地位意义、会议精神、人物作用等进行了详实探讨与考证,相关史料的集结出版也为研究提供助力。在这一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征委)曾对遵义会议进行过专门调查,这是第一次由官方组织的调研活动^{[2]99}。此次调查形成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对会议时间、参加人员、进行情况等进行了扎实考证,既对此前很多存在争议或者由于资料缺乏而无法弄清楚的问题作出权威回应,又为此后研

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这是一次承上启下的调查。然而,学界对这一调查却缺少系统研究,本文围绕调查报告的形成与发表,试就遵义会议调查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作一考辨。

一、启动遵义会议调查的背景分析

党史兼具政治性与学术性。搞清楚党史上的重要问题,不仅是党史研究职责所在,更是党史宣传教育工作的基础。但在“文革”时期,党史上的诸多问题或成为禁区,或根据政治需要而被随意篡改,党史也被简化为了党内路线斗争史,严重侵蚀了党史的科学性。“文革”结束后,伴随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逐步展开,党史研究与资料征集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特别是党的十一

【收稿日期】2023-06-21

【作者简介】王怀乐,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政治与行政制度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研究”(21ZDA074)。

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痛定思痛，逐渐消除个人崇拜，着手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是非进行正确评价。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为党史研究开拓了广阔空间，进一步推动了党史研究工作。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但之前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以致对会议的一些重要细节长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征委对遵义会议进行了详细调查。

（一）改革开放后党史研究与资料征集的正式起步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研究与资料征集工作，“文革”以前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相较预期远远不够。“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加强党史研究、编写党史定本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号召全党研究党史，将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编写党史定本工作也开始提上日程。同时，学界研究逐渐恢复活跃，但也面临着种种困难，主要是没有领导机构，没有资料，也没有交流园地^[3]。很快这些问题都有了相应解决。

1979年9月，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开始筹办党史研究刊物。经过数月努力，1980年1月，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党史研究》创刊。《党史研究》虽是内部发行，但作为一份研究党史的学术性刊物，在改革开放初期“为研究中共党史、交流研究成果、总结历史经验、进行拨乱反正、积累文献资料，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园地”^[3]。

几与刊物创刊同时，1980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通知》，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负责审定党史编辑计划，决定对党史中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最后审定全书书稿。在中央党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编审委员会，负责党史编辑工作中的各项重要问题，初步审定全书书稿。在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研究室，直接负责党史研究、编写和资料收集工作。胡乔木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首任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记录党六十年来光辉战斗历程，编写出一部党史正本。

权威党史写作离不开丰富史料的支撑。陈云同志曾有过这样的指示：“有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党史资料，有了全党公认的党史正本，即使以后出现野心家篡改党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就可以把确凿的史料拿出来，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为了编好党史，首先要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这一指示把全党征集研究和利用党史资料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4]²⁷⁰。然而，党史资料浩如烟海，各地方、各部门均在从事收集和征集工作，并出版了部分成果。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后不久，胡乔木就指出如果没有统一领导，有可能会造成党史资料的散失，或者发生各部门相互封锁的现象，加上出版党史资料也需要统一领导，因此，“党史资料的收集和征集工作要另外成立一个委员会”^[4]²⁶⁹。1980年5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成立以冯文彬同志为主任委员的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5]⁵³。此后，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党史研究、编写工作和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才逐步开展起来^[6]⁴³。

（二）遵义会议纳入中征委研究专题

中征委成立之初，面临着党史上的很多争议问题，甚至同样一个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给史料征集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因此，对一些专题的史料征集就必须结合研究进行。遵义会议又是如何进入中征委视野的呢？

中征委成立后的几个月内，资料征集工作就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也存在多而杂的情况。1980年12月，中征委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了成立半年多时间的工作。冯文彬指出，“要搞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首先要摸清情况，要有目的、有计划、有分工地去搞。现在各单位是按照自己的需要，碰到什么搞什么，这样有可能挂一漏万。现在要理出个头绪，对于党史上各种各样的问题要逐一地开列出来，可以把问题分成各种不同的种类，有的可以按时间，有的可以按事，有的可

以按人。至少要先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的问题理出来，抗日战争时期的可以稍缓，因为这个时期的老同志在世的还多一些。问题列出来以后，各单位再分工，每个问题一两个人去搞，这样就会搞得快一些，也可以避免漏掉”^{[6] 5}。会议决定，要尽快地拟定一个党史资料研究大纲，将抗战以前党的历史上的各种问题分时期、分专题逐一列出来，以便有计划、有分工地进行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6] 7}。显然，遵义会议属于抗日战争以前阶段的重要事件。

再者，通过费侃如的一些分析，我们也能够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费侃如（1937—2022年）曾任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被称为遵义会议研究的“活字典”，曾参与此次遵义会议调查。1980年，《党史研究》第5、6期发表了费侃如两篇关于遵义会议研究的文章，讨论遵义会议时间以及张闻天会议上任职问题^①，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最早的关于遵义会议研究文章，引起了刚成立的中征委的注意，也引发了学界的进一步讨论。转年，《党史研究》第2、4期又刊发了刘晶芳、李海文两位学者关于遵义会议时间问题的研究成果^②。1982年，费侃如又就遵义会议时间对之前讨论作出回应^[7]，同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田兴咏又对费文作出回应^[8]。可见，在中征委调查前后，对遵义会议相关问题的讨论已经有所展开。

除了文章的因素，费侃如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1979年底，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45周年，费侃如等人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指导方针，提出修改“文革”期间陈列布展的建议和意见，却遭到有关领导的批评。恰好新华社两名记者到纪念馆采访，碰到了费侃如，认可了费侃如的修改方案，经过调查采访后，便写了题为《发生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场争论》的报道，刊发在新华社《内部参考》（1980年第1期）上。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在这份内参上作了批示，随即转发到当时的全国县团级单位^[9]。不久后，遵义地委宣传部也找到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纪念馆很快按费侃如等人的方案进行整改，并于1980年1月8日对外开放，当天还邀请了一些老红军、

老干部等举行座谈，受到广泛好评。9日，新华社发表题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按历史本来面目修改陈列受到欢迎》的电讯，10日，《贵州日报》以《遵义会议纪念馆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为题在头版头条刊出，国内外部分媒体也都予以转发。结合当时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发展形势，这一事件也极有可能对几个月后成立的中征委产生影响。

因此，学术争鸣与高层领导介入的双重影响下，遵义会议进入中征委的视野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二、调查之前：三份基本参考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筹备与建立，有关遵义会议的史料、文物征集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这为遵义会议调查打下了良好基础。尽管中征委成立初期的中心任务就是征集史料，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对具体专题的研究。因而，中征委在遵义会议调查上采取了史料征集与专题调研相结合的方针，调查的过程同时也是史料搜集的过程，不仅充分利用好遵义会议史料的存量，还注重提升遵义会议史料的增量。其中，有三份资料最为重要，成为撰写调查报告的重要依据。

（一）关于遵义会议决议及其大纲

在调查初期，有两份参考材料最为重要，第一份是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简称会议决议）。决议开门见山，明确指出博古所作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随后从十四个方面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批评，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并指明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囿于当时形势，会议暂未详细检讨政治路线。

这一决议以《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③为题收录于《六大以来》^{[10] 669-678}。《六大以来》文件集最早是中共中央

书记处于1941年12月在延安编印的，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在北京再版，1980年，中央档案馆委托人民出版社在1952年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于1981年内部发行。这一决议均收录在三个版本的《六大以来》当中。1957年，这一决议还曾收录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批。

此外，改革开放前后，这一决议也收录于不同高校所编的教学参考资料当中。例如，1975年，这一决议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为题收录于贵州大学历史·哲学系所编《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一书中^[11]；1977年，这一决议以《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1935.1.8政治局会议通过）》为题收录于《中共党史学习与参考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册^[1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8月，为了适应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辑了《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供该系教员和学生使用，遵义会议决议以《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为题，收录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下册，并于1980年1月出版^[13] 6-23。可见，遵义会议决议无论是中央文件层面，还是教学科研层面，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需要指出的是，决议通过的时间是不准确的。之前之所以认定决议在1935年1月8日通过，是因为决议手写稿上的时间就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但经过此次调查，初步判定决议通过的时间为1935年1月17日，即会议结束的当天。

第二份是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大纲，实际上就是遵义会议决议的简要版。这份大纲的主要内容存在于两份文献中，一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下简称决议大纲）。1979年，决议大纲以《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为题收录于《中共党史学习参考资料》^[14] 95-98；1980

年，决议大纲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为题收录于《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下册^[13] 31-34。1983年，决议大纲与会议决议、调查报告等重要文献一并收录于《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15] 55-58。然而，1985年1月公开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却并未收录这一大纲。二是《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委电（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这一电报根据中央档案馆油印本而来，落款是“书记处”，收录于公开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16] 33。但经过对比，这一电文除个别字句、标点符号之外，其他内容几与决议大纲一致。

因此，遵义会议调查之前中征委所掌握的重要材料，主要就是会议决议及其大纲。通过这两份材料，可以了解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但更多的会议细节并没有更多体现，需要挖掘其他材料才能得知。

（二）关于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手稿

1956年党的八大之后，中央办公厅曾派人前往莫斯科，接收回一大批1922年至1943年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后来这批档案被存放在新成立的中央档案馆，成为开馆馆藏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一份题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手稿，是用钢笔写的，用的纸是长20.1厘米、宽14.4厘米的活页纸，共8页4600多字，记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相关历史情况，包括会议召开的时间、目的、参会人员、酝酿过程、会议决议以及与会议有关的中央组织变动情况等。

但就是这样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手稿上却没有署名和日期等信息。1980年以前，这份手稿只向为数很少的党史研究部门提供过复印件^[17] 138，其中就有遵义会议纪念馆。1991年5月26日，叶永烈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查阅有关档案时，曾在195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档案部门（中共中央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6月。此前只有中共中央档案部门）致该馆的一份公函中，见到引用过这份手稿中部分内容，注明那是“一件未署名的文件”。那份公函表明，早在1959年，当时的中共中

中央档案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份未署名的手稿^{[18] 51}。直到1981年,在中征委从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些材料中调查遵义会议的时候,中央档案馆向中征委提供了这份珍贵的文献原件^{[19] 105}。

为了确定手稿的作者,一方面,中征委和中央档案馆先后找到了参加遵义会议的王稼祥和其他几位老同志的笔迹,请有关单位作科学鉴定,结果都被否定了^{[17] 138-139}。另一方面,1982年4月23日,中央档案馆把这份提纲的复印件报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杨尚昆、伍修权(时任翻译)等人,请他们审阅,看看是谁写的。除陈云外,其他几位很快回复说不是自己写的^[20]。5月9日,陈云通过秘书转告中央档案馆:“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因为过了泸定桥,中央决定我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长征队伍。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当时留下的,后被其他同志带到延安。”^{[21] 341}为进一步确认,陈云同志还调阅了原件。他说:“原稿用的纸不是好纸,一看就是‘拍纸簿’上撕下来的,这种本子那时在遵义是能够买到的”^[20]。以后,提纲撰写时间又根据提纲内容被判断为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它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有关遵义会议内容的最为完整的原始材料^{[21] 341}。关于陈云确认手稿一事,曾任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陈海楼还曾讲过这样一个细节:“开始去问陈云同志,他说不记得了,不是他的笔迹。后来经过公安部门鉴定笔迹,确定就是陈云同志的,于是再去找他,陈云同志经过仔细的回忆,说是在长征中给总部直属纵队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时的一个传达提纲。”^[22]

因此,手稿就是陈云同志所写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这份手稿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以下简称传达提纲)为题收录于《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传达提纲保留了许多尚未公布的历史资料,“对弄清遵义会议的许多关键问题,帮助党史学界深入研究遵义会议,具有重大的意义”^{[15] 12}。

三、起步阶段:调查报告初稿 (1983年2月稿)的形成

此次调查由中征委主导,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贵州省有关部门以及遵义会议纪念馆等单位配合协助,特别是在史实考证方面得到了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帮助。可以说,调查是一项集体劳动成果。过程中,有两个版本的调查报告稿最为重要,一是起步阶段形成的调查报告初稿“1983年2月稿”,二是深化阶段形成的调查报告修改稿“1984年9月稿”,此稿于1985年1月公开出版。本节先就“1983年2月稿”作一考察。

(一) 调查启动时间考

会议调查是何时开始的?有1981年初、1981年底两种说法。前者来自调查亲历者,后者来自调查采访者。

参加过调查的费侃如指出,中征委于1981年初组织了一个专门调研遵义会议有关问题的小组,对会议的时间、参加人员、进行情况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调研^{[2] 99}。而在另一篇文章当中,费侃如又提到:1981年底,当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对遵义会议进行专题调查时,中央档案馆才正式提供这份珍贵的文献原件(即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之后证实作者为陈云),但不知是谁的笔迹^{[17] 138}。此处的1981年底,应该理解为中央档案馆正式提供陈云手稿的时间。

曾对会议调查进行过采访的邹爱国指出,1981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对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23]。此外,1981年12月15日,《党史资料通讯》第28期刊载了《目前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参考提纲(一)》,第八条为“遵义会议召开的情况,会议的组织决议及其主要内容如何?”^{[6] 97}提纲下发是否意味着调查开始?前文提到,1980年12月中征委决定尽快拟定一个党史资料研究大纲,将抗战以前的问题列出来。而1981年底这一提纲发表分为九个部分:“党的创立时期、第一次大革

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初的设想，其成文周期比较长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参加过调查报告撰写的彭咏梅曾撰文指出，为了给党史研究和编写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供可靠的资料，中征委于1981年12月向全国各地、各部门以及军队系统的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或征集小组）下发了《目前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参考提纲（一）》，要求“依据实际情况，组织了解情况的有关人员撰写回忆录或提供资料和线索，并请随时转送我委，以供研究党史之用”^{[24] 187}。可见参考提纲的下发是为了提供明确的主题以便让各地方、各单位更好地征集资料，并不能直接证明调查开始时间就是1981年底。

还有一个信息可提供佐证。1983年5月25日，马石江在中直机关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指出，“去年（1982年），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写了一个《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李志光等同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就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参加会议的人员、会议进行的情况、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职务等问题进行了核实和研究，写出了调查报告。”^{[4] 251}1982年写成的稿子是征求意见稿，因为当年12月28日陈云对征求意见稿作出了批复。根据这一论述中“花了一年多时间”关键信息推测，若是1981年底开始调查，一年多后写成征求意见稿应该到了1983年。因此，可以判定，此次调查是在1981年初开始的。

（二）报告初稿的主要内容

此次调查主要由中征委工作人员李志光、陆友山、周克、彭咏梅等人负责。在调查过程中，中征委主要采取查阅档案资料、访问有关当事人以及进行实地调研等方式开展工作。例如，1981年、1982年，中征委分别搞了两次专题调研，遵义会议纪念馆均派员参加^{[25] 61}。根据遵义会议纪念馆工作人员田兴咏回忆：“为了配合中征委对遵义会议的研究，我还与纪念馆的另外一位副馆长

费侃如，曾先后赴京，携带有关材料与中征委的李志光等一块进行研究，提供我们掌握的一些基础资料”^{[26] 80}。由上可知，田兴咏与费侃如不仅参加了调研，而且还提供了相关资料。1983年3月28日，中征委办公室主任李志光与研究员陆友山到遵义调研，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等纪念建筑之后，还与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研究人员进行座谈，并查看了纪念馆的一些馆藏历史资料^{[26] 80}。

此次调查主要是要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会议时间、参会人员、会前酝酿、会议进行情况、会后组织调整情况等。

1. 关于会议时间，此次调查之前就有各类说法，流传最广的时间是1935年1月6日至8日，这是由会议决议上“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信息来确定的。根据当年中央办公厅的答复，遵义会议纪念馆一直宣传的就是这一时间。此次调查根据当年的电报、国民党方面的资料以及陈云手稿，确定会议时间为1935年1月15—17日。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当年参会者的认可。1985年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收录的决议全文，将决议通过时间改为了1935年1月17日，并作出注释：“本决议现存的各种版本，都在题下注‘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据查证，会议结束日期是一月十七日；决议虽是在会后写成的，自应仍署会议结束日期。”^{[16] 26}

2. 关于参会人员及其职务，在此之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21人^④，遵义会议纪念馆在1980年1月对外开放时所展出的参会人员名单，也是21人。这与调查最终确定的20人名单唯一的差别就是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此次调查根据陈云手稿、来往电报以及当年参会者证明，确定董振堂没有参会；又根据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单位提供的材料以及一些老同志的回忆，确定了参会人员会议前的职务信息，更正了之前的一些错误。例如，以往认为刘少奇、王稼祥参会前的职务是政治局委员，经过这次调查，证实二人会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费侃如曾在1982年发文，根据1934年1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全会的召开情况，结合1980年4月8日中央组

组织部办公厅复遵义会议纪念馆函，认为“王稼祥同志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分出席会议的可能性是很大的”^[27]。这篇文章首先在国内党史界对王稼祥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出席遵义会议提出了质疑，后经中征委调研确定，王参加会议时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28] 300}。

3.关于会前酝酿情况，主要依据会议决议、传达提纲、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以及老同志访谈、回忆录等内容形成。通过对会前酝酿情况的详细介绍，此次调查澄清了相关史实，批驳了所谓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宗派主义产物的不实之词，使我们对会议召开的必要性、紧迫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4.关于会议进行情况，主要依据会议决议、传达提纲、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以及老同志访谈等内容形成。此次调查对会议经过、会议决定等作了比较详细的梳理，也指出了会议暂未检讨政治路线的原因。

5.关于会后组织调整情况，主要依据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遵义会议纪念馆提供资料以及当年参会者李德的回忆录等内容形成。此次调查对洛甫代替博古职务、三人军事小组问题做了详实考证。

（三）征求当年参会者意见

经过近两年的调查研究，1982年12月中旬之前，中征委李志光、陆友山等人写成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这一报告可靠程度如何需要权威鉴定，好在当时参加遵义会议的老同志仍然有几位健在。于是中征委将这一征求意见稿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杨尚昆、伍修权、李卓然等人审核。这六位老同志均审阅报告并作了批复^{[15] 15}。其中尤以陈云写的1000多字的复信最为重要。陈海楼曾指出，其他老同志“一致认为陈云同志的意见是权威性的意见”^[22]。

笔者目前只能查到邓小平、陈云、杨尚昆等人的回复。1982年12月10日，邓小平审阅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后作出批示：“遵义会议的细节我也记不清楚了，‘鸭鸡’应是‘鸭溪’。”^{[29] 173}如果按

照陈海楼的说法，邓小平在之后应该还有一次表态，但目前尚未找到证明材料。

12月28日，陈云对征求意见稿作出批复，充分肯定了报告考证清楚的五个问题，认为报告的“根据是可靠的、充分的，所以结论都是对的”^{[15] 14-15}。同时对报告中尚未清楚的几个问题作出回复。一是关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是否增补为书记处书记的问题，陈云认为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均未设置书记处，且毛泽东是否为书记处书记并不影响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政治局领导核心这一事实。因此调查报告（1983年2月稿）并未在毛泽东是否为书记处书记这个问题上纠缠，而是采纳了陈云手稿中的说法——“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15] 25}。二是关于遵义会议前后中央是否设有总书记职务问题，陈云认为自向忠发后到党的八大期间并未设过总书记。调查报告（1983年2月稿）吸收了这一意见，认为“当时中央并无总书记职称，洛甫和博古也未用总书记的名义”^{[15] 27}。三是关于董振堂是否参会问题。早在1977年8月23日，陈云同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访人员谈话时提到：“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参加了遵义会议，我的印象很深；对董振堂、李卓然参加的印象少些。”^{[21] 236-237}而此次批复则肯定董振堂没有参加会议，并分析了可能的原因。这也成为调查报告（1983年2月稿）确定董振堂没有参会的依据之一^{[15] 32}。陈云的批复为调查报告的进一步完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杨尚昆则在批复中写道：“事隔多年，我虽是一个参加者，但许多细节已记不清了。陈云同志写的传达提纲和最近的信，我认为具有权威性的，是了解遵义会议的重要依据。关于会议的日期，肯定不是一月八日，这是有各方面的证据的。我同意定为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4] 252}杨尚昆的批复肯定了陈云的意见，并确认了会议召开时间。显然，这是12月28日之后的事情了。

（四）报告初稿内部发行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获得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肯定后，在此基础上形成“1983年2月稿”，于下半年

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这一辑资料花了五分之一的篇幅专设“遵义会议专题资料”，包括以下内容：“（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附：发表陈云同志《（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说明”，“陈云同志对《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批复”，“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附图：党中央、军委纵队进入扎西地区路线及宿营时间示意图”，附录包括“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张爱萍同志为遵义会议纪念馆书写的诗词二首”等内容^[15]。

奇怪的是，第6辑并没有标注出版的具体时间。根据版权页描述，《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的出版时间为1983年9月，第7、8辑出版时间均为1983年11月，照此推断，第6辑出版时间应该在9—11月这段时间。而根据《陈云年谱》的记载，1983年8月，《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刊出”^{[21] 341}。若以《陈云年谱》时间为准，则这一报告最早于1983年8月内部刊出。同时，《陈云同志对〈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批复》与《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也在《党史通讯》^⑤1983年第19期（1983年10月15日）上内部刊出。总之，“1983年2月稿”于下半年内部刊出是可以肯定的了。此后，随着部分机构因教学研究需要翻印此稿^⑥，进一步扩大了调查报告的影响。

四、深化阶段：调查报告修改稿 （1984年9月稿）的形成

调查报告（1983年2月稿）内部发行后，调查并未结束，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研究。因此，中征委在调查报告（1983年2月稿）的基础上继续调查、研究、考证，形成了调查报告修改稿

（1984年9月稿），使相关表述更加确切。

（一）调查报告相关问题考证举要

关于遵义会议是否有“前会”问题，需要弄清楚提议是否有被落实。根据1943年11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载，杨尚昆曾提议在遵义会议前先开中央会议，再开扩大会。但根据中征委掌握的资料，军委纵队于1935年1月9日进入遵义，扩大会是1月15日开始的，尚未找到在扩大会前先开中央会议的记载。1983年6月27日，中征委致信杨尚昆，请其回忆当时是否在扩大会议前曾开过中央会议^{[30] 12}。7月13日，杨尚昆作出回复：“遵义会议时，彭德怀同志和我得到通知参加会议。当时我可能向博古同志提出过，先开中央会议再开扩大会的建议。但此建议并未被采纳，博古是如何答复我的，已记不起来了。事实上也没有先开中央会议而是召开了扩大会”^{[30] 11}。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陈云手稿）的成文时间，最初是按照陈云的回忆来确定的。《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在刊发陈云手稿之后附有一个说明，明确指出“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行军途中”^{[15] 11}，即1935年2月10日至5月29日这段时间。胡乔木认为，“这段时间太长了，也不合情理”。因此，他根据手稿中提到的洛甫代替博古职务一事（2月5日前后），并结合伍云甫日记有关会议传达的记载，确定传达提纲形成时间最早在2月中旬；又根据传达提纲未提到成立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小组一事（3月11日左右），由此估计提纲写成和传达的时间是在3月11日以前。因此，1984年11月25日，胡乔木致信陈云，请示是否可将传达提纲的写成日期改为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即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31] 250-251}。此时，《遵义会议文献》一书已经排出清样，即待付印。27日，陈云即回信同意胡乔木的考证。由此在1985年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一书中收录《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时，标题注释中直接点明“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中旬，具体日期尚难确定”^{[16] 34}。

(二)“1983年2月稿”与“1984年9月稿”的区别

相比而言,调查报告(1984年9月稿)有了比较大幅度的修改,现就报告每一部分的主要不同之处列举如下。

1.会议时间部分。“1983年2月稿”提到的基本参考资料是《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通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以及《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而“1984年9月稿”则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委电》(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且遵义会议决议通过时间直接改用会议结束当日(1935年1月17日),而不用档案上原标注的时间。决议大纲也替换为中央电报,尽管二者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陈云手稿则改用新的名称,题目去掉编号,增加了“传达提纲”四字,与内容更加契合。

“1983年2月稿”引用陈云手稿中的一句话为“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然而,“1984年9月稿”引用这句话时,却将“完成”改为了“作出”,这种对原始档案的修改并没有专门说明,不知是何原因。

关于遵义会议决议上为什么标明该决议是在一月八日通过的,原因并未查清。“1983年2月稿”给出的一种解释是决议写成文字是在会议之后,“当时戎马倥偬,事后标错日期是可能的”。而“1984年9月稿”则推翻了这种解释,并通过伍云甫的日记,证明洛甫起草决议时并没有标错日期。但仍然强调“当时戎马倥偬,事后刻印文件时抄错日期而没有引起注意是可能的(17和八的旧体八字形相近)”。事后刻印文件抄错是极有可能的。但问题在于,前面用的是汉字“一”,后面要是用阿拉伯数字“17”,似乎也不符合写作体例。这一问题的解决要等数年之后了,后文将有叙述。

2.参会人员部分。“1983年2月稿”列明了人员名字以及会议前所担任的党内外主要职务,并根据陈云手稿确定17人为参会人员,手稿上没有记录的邓小平、李德、伍修权则视为列席人员。邓小平职务为“《红星报》主编”,此处注释内容如下:“引自伍修权同志《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其中写道:‘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原载《星火燎原》季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第24页,战士出版社出版”^{[15] 32}。“1984年9月稿”则更加简洁,参会人员名字没有变化,只是简单分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秘书长、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等类别,以及写明李德和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不再区分参会与列席。邓小平职务也直接更改为“中央秘书长”。

3.会前酝酿情况部分。该部分修订之处较多,但核心观点没有变化。对陈云手稿相同部分的引用,两稿却仍然存在个别词句上的差别。

4.会议进行情况部分。该部分修订之处也较多,但核心观点没有变化。对会议决议相同部分的引用,两稿却存在个别词句上的差别。“1983年2月稿”引用会议决议“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一句,而“1984年9月稿”改为了“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意思并无差别。1985年《遵义会议文献》重新公开发表会议决议时,中征委曾参照其他版本,订正了少数标点和个别错别字^{[16] 26}。但“1984年9月稿”的改动之处,却算不上错别字之列。

5.会后组织调整部分。“1983年2月稿”指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在鸡鸣三省”,而“1984年9月稿”用词更加谨慎,指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前后在鸡鸣三省一带”。时间与地点都是大概范围。对于博古和洛甫的职务,两稿均指出当时并没有用总书记的名义,“1984年9月稿”则增加了“只用书记的名义”表述,使内容更加确切。

关于三人军事小组,“1983年2月稿”用的是

“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表述，而“1984年9月稿”则用的是“三人军事小组”，并作出解释：三人军事小组，也有称之为“三人团”“三人小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16] 137}。而对于三人军事小组定位，“1983年2月稿”将其视作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1984年9月稿”则改为“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显然这一表述更加准确，更符合当时的情况。对于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小组的意义，“1983年2月稿”指出这表明“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1984年9月稿”在此表述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也标志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此外，“1983年2月稿”有两处还曾直接引用李德《中国纪事》一书的内容，而“1984年9月稿”则将这两处引用内容直接从正文中删除，但在一处注释中引用了李德《中国纪事》书中的内容。

最后，“1983年2月稿”列出了此次调研报告的作者，即“责任调研整理：李志光、陆友山，参加者：周克、彭咏梅”，“1984年9月稿”则没有这一信息。

五、完成阶段：调查报告以及相关史料的公开发表

调查报告是此次调查的最终成果，其面世经历了一个从内部发行到新闻报道，再到公开出版的过程。并且，1985年是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调查报告连同相关史料的公开出版，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新发现的遵义会议史料》报道

1983年内部刊出的调查报告，受众毕竟有限。1984年3月4日，一则题为《新发现的遵义会议史料》的新华社报道引发了人们的关注，翌日此文也发表在《瞭望周刊》上^[23]，而这一切与新华社记者邹爱国是分不开的。

邹爱国在对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一次采访中，得知遵义会议调查弄清了党史研究中亟

待解决的问题，但由于当时这件事情仍处于保密阶段而无法发表。大约过了半年时间，邹爱国得知中央已经批准了关于遵义会议的调查报告，于是以新华社名义请示胡乔木能否发布相关消息并送去消息稿。胡乔木同意发布消息，并指示发布一个长一些的报道，以便让读者看到更为详细的调查^{[32] 247-248}。于是，便有了1984年3月的公开报道。

邹爱国在《中南海新闻实录》一书中，附上了当时的稿子，落款时间是1983年8月，但新闻报道发出已经是1984年3月的事情了，因此1983年8月应该是成文时间^{[32] 254}。再者，邹爱国在另外一本书中同样收录了《新发现的遵义会议史料》一文，但落款时间为“1984年3月”，这一时间显然是公开发表的时间^{[33] 222}。结合新闻报道发表时间以及对比新闻报道内容与调查报告内容来看，邹爱国所依据的调查报告稿应该是1983年2月稿。

这篇约3500字的报道，对遵义会议召开时间、参加人员、会议决议、会后中央组织的调整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贵州日报》《山西日报》等也都作了转载。这为人们了解遵义会议的相关史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二）《遵义会议文献》公开出版

为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1984年11月，由中征委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遵义会议文献》一书定稿，并于1985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邓小平为该书题写书名，陈云、聂荣臻、杨尚昆、伍修权题了词。

该书是由胡乔木亲自主持编辑的^{[34] 95}，共六万余字，分两辑。第一辑收录了遵义会议决议、中央通报会议情况的电报（内容与会议决议大纲相同）、会议传达提纲（陈云手稿），即前文所述调查报告所依据的三份基本参考资料，以及党的第一个、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有关遵义会议内容的节录。第二辑主要收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参会者关于遵义会议的论述和回忆，以及陈云对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的答复。附录就是此次调查报告（1984年9月稿）。绝大多数资料是首次公开发表。

该书所收录文献资料除注明是中央档案馆存件之外，其他文献均为中征委征集或编辑的。在中征委征集或编辑的文献中，部分直接取材于公开出版物，《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陈云，1982年12月28日）一文直接来自陈云的答复，《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提纲节录）》（刘伯承，1962年7月）一文是“据一九六二年七月在军事学院的谈话记录稿”^[16]⁹²形成的。此外，各篇注释除张闻天一文是由《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提供外，也是由中征委所加。

该书的出版引发广泛关注，1985年1月14日，《人民日报》曾对此作出专门报道^[35]。不久后的1月17日，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让这一珍贵手稿为更多人所知^[36]。2009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纪念遵义会议召开75周年，让更多人了解会议，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系统资料，遵义会议纪念馆编辑并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31]。《汇编》比《遵义会议文献》内容上更为详实，不仅收录了会议参加者的回忆，还收录了会议精神传达与贯彻者的回忆。《遵义会议文献》也在同年再版。但《汇编》一书收录的是调查报告（1983年2月稿）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1935年2月8日），《遵义会议文献》收录的是则调查报告（1984年9月稿）和《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委电》（1935年2月28日），二者互为补充。

（三）遵义会议调查完成之后

当然，调查报告的公开发表，绝不代表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结束，后续针对遵义会议的研究仍然在不断产生各类成果，其中部分成果对调查报告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也作出了权威解释。例如，调查报告“1983年3月稿”与“1984年9月稿”均指出“至于遵义会议决议上为什么标明该决议是在一月八日通过的，现在尚未查清”^[15]¹⁹、^[16]¹²⁶。两个版本的报告也均给出了可能的解释。1991年，这一决议仍以《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为题，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公开发行。但在通过时间“一月八日”上作出了最新注释：“档案原件所标‘一月八日’有误。这次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于1935年1月15日开始，17日结束的。决议是在会后写成，并于2月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另有一份档案原件即标‘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主要内容是遵义会议所定。”^[37]⁴⁷⁴这里所说的“另有一份档案原件”，就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落款是“中央书记处，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内容就是遵义会议决议的简要版^[15]⁵⁸。

《人民日报》曾对此考证过程有过简要报道：“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作出决议的时间，一直是党史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选集在收编这一文件时，发现了五个版本，其中一个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二月十六日印发’的油印稿。编者认为，这一版本确是一九三五年印制的文件正本，是目前发现的《决议》最早的、最可靠的版本。经过细致考证，编者判定‘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二月十六日印发’，是可靠的。……这一考证结果，纠正了长期以来各种史著中延续的错误。”^[38]据此，可以推测决议通过时间之所以写成“一月八日”，而不是“二月八日”，应是少写一横的笔误。

再如，调查报告关于会议发言情况的介绍，只是说了会议开始时博古作主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笼统地提了一句“其他同志也对博古同志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实际上，张闻天在会议上的发言同样不容忽视，他在周与毛之间作了一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的错误。关于张闻天的发言，1979年8月，邓小平在张闻天追悼会上的悼词中指出，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39]，此后的一些研究也承认这一点，

但对于发言顺序,有的研究指出在博古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朱德、王稼祥、陈云、彭德怀等同志相继发言”^[40],也有研究在叙述发言时采取的是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陈云、朱德、彭德怀的顺序^[41]。1985年是遵义会议50周年,杨尚昆发表回忆文章,明确指出“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闻天同志讲完之后,泽东同志接着发言,分析了‘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症结所在”^[42]。这是亲历者的回忆,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从当时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处境以及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来看,周恩来之后由张闻天发言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有相当一段时间并不在核心领导层内,而张闻天当时既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又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参会者中地位仅次于博古而与周恩来相当。此后的《张闻天传》便吸收了这一观点^[43]²⁰¹。这类成果进一步完善了对遵义会议情况的史实研究,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结 语

遵义会议调查是在我们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大背景下,由官方研究机构对党史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的一次“正本清源”,不仅澄清了诸多会议细节,而且对会议的评价比以往更进一步,体现了科学严谨的态度。特别是围绕遵义会议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评价,调查报告吸收了党的两个历史决议观点,做出了新的评价。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44]⁹⁶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评价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45]³⁴。以上观点成为一段时间内评价遵义会议

的重要依据。而1981年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评价有所突破,指出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46]¹²⁶,因为毛泽东确立全党领导地位是长征胜利以后的事情了。显然,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评价更为准确,这样一种变化实际上为后来的调查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进一步澄清历史细节的空间。因此,调查报告(1983年2月稿和1984年9月稿)并未局限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提法,指出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从第一个历史决议的“为首”到报告的“为代表”,尽管只有数字之差,但后者无疑更加精确。

这次调查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此后关于遵义会议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评价也越来越准确、丰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47]¹²⁷增加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从组织程序上看,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并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也不是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在之后的行动中,毛泽东以其卓越才能使之成为党中央和红军的真正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又有了新的提法,指出“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48]¹⁵⁸。而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则综合了此前的种种评价,指出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49]⁵⁹⁻⁶⁰。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均沿用此评价。由此可见,我们党对于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评价是

慎重的，能够随着认识的深入而实事求是地作出修订。学界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研究上尊重决议而又不拘泥决议，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学界能够冲破思想坚冰，广泛而又深入地开展研究，产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既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教材和参考书，又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提供武器。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史的研究、宣传与教育，并为此提供了大力支持，投入了大量资源，这为党史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期。习近平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学习党的历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修好这门课，就必须树立正确党史观，还必须要有立得住的史实与史料。通过对遵义会议调查过程的考察可以得知，澄清史料、搞清史实，绝非易事，但这又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有助于我们对党史上的重要问题正本清源，更好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我们必须抓住这一宝贵机遇，久久为功，不断探索，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不断产出经得起实践检验、历史检验、人民检验的作品。

注 释：

- ①参见费侃如：《遵义会议召开和结束的时间问题》，《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1980年10月28日出版）；费侃如：《对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上任职问题的认识》，《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1980年12月28日出版）。
- ②参见刘晶芳：《也谈遵义会议召开和结束的时间》，《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1981年4月28日出版）；李海文：《关于遵义会议召开和结束时间的商榷》，《党史研究》1981年第4期（1981年8月28日出版）。
- ③目录中以此为题，正文中主标题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副标题为“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 ④这21人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刘少奇、何克全（凯丰）、邓发、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邓小平、伍修权、李德。参见胡华：《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的若干历史情况》，《江淮论坛》1979年第2期；倪毓英：《遵义会议》，人民日报1980年4月11日；等等。
- ⑤《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1月起改为《党史通讯》）于1981年1月创刊，是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
- ⑥如1984年3月，桂林陆军学校党史政工教研室就曾翻印过调查报告（1983年2月稿）。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遵义会议纪念馆，编著. 遵义历史文化十讲[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 [3] 杨往夫，于吉楠.《党史研究》杂志创办始末[J]. 百年潮，2010(12).
- [4]《纪念马石江同志文集》编辑组，编. 用火写在天空的生命——纪念马石江同志文集[G].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 [5] 北京市档案局，辑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档案工作重要文件选编：第1集[G]. 1985.
- [6]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党史资料通讯（一九八一年合订本）[G].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7] 费侃如. 关于遵义会议时间问题的考证[J]. 贵州文史丛刊，1982(2).
- [8] 田兴咏. 也谈遵义会议的时间问题[J]. 贵州文史丛刊，1982(4).
- [9] 张小灵.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如何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J]. 党史文苑，2009(1).
- [10]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 六大以来：上[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1] 贵州大学历史·哲学系，编. 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G]. 1975.
- [12] 曲阜师范学院政史系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中共党史学习与参考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G]. 1977.
- [13]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下[G]. 校内用书，1980.
- [14] 广东省高等院校《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编写组，编. 中共党史学习参考资料[G]. 1979.
- [15]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G].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

- [16]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7] 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陈云与遵义会议[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
- [18] 叶永烈.他影响了中国:陈云[M].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
- [19]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工作文件汇编(1959—1984),1985.
- [20] 王刚.不朽的功勋 崇高的风范——关于陈云同志一些档案文献的回顾[J].党的文献,2015(4).
- [21]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22] 陈海楼.认真总结经验 提高业务水平 全面认真地开创党史资料管理工作的新局面——在全省党史资料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9月6日)[J].安徽党史资料通讯,1984(10).
- [23] 邹爱国.新发现的遵义会议史料[J].瞭望周刊,1984(10).
- [2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 [2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遵义市红花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红花岗文史资料 纪念人民政协成立五十周年专辑:第2辑(总第32辑),1999.
- [26] 田兴咏.遵义会议纪念馆接待手记[M].遵义:贵州省遵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2014.
- [27] 费侃如.王稼祥同志参加遵义会议时的身分质疑[J].近代史研究,1982(4).
- [28] 费侃如.遵义会议研究论稿[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 [29] 邓小平年谱: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30]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8辑[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
- [31] 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32] 邹爱国.中南海新闻实录[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
- [33] 邹爱国.中南海内外[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
- [34] 程中原.信史立国 当代中国史研究纵横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35] 陈汉孝.《遵义会议文献》出版[N].人民日报,1985-01-14.
- [36]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N].人民日报,1985-01-17.
- [3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3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布一批珍贵史料[N].人民日报,1992-12-07.
- [39] 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 邓小平同志致悼词[N].人民日报,1979-08-26.
- [40] 李安葆.关于遵义会议的几个问题[J].贵州社会科学,1981(04).
- [41] 费侃如.遵义会议及其前后[J].贵州文史丛刊,1981(03).
- [42] 杨尚昆.坚持真理 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N].人民日报,1985-08-09.
- [43] 程中原.张闻天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 [44]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5]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46]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47]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 [4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 [49] 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责任编辑 刘 滢】

(下转至第116页)

[16]伍修权.回忆与怀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17]童小鹏.少小离家老大回——童小鹏回忆录[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18]李先念同志关于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和革命回忆录问题的谈话要点[J].中共党史研究,2009(4).

【责任编辑 刘 滢】

An Example of Adhering to Principles While Applying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in Handling Zhang Guotao Issue

WEI Deping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Abstract: During the Long March, to maintain unity within the part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did much persuasion to convince Zhang Guotao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t contended with him resolutely on issues of principles, such as the political line and military strategy. It issued the Decision on Comrade Zhang Guotao's Mistakes to clarify the essence of the controversy and rift between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Zhang Guotao. After Zhang arrived at northern Shaanxi, the Central Committee conducted a concentrated criticism on his mistakes committed in the Long March and issued the Decision by the Central Political Bureau on Comrade Zhang Guotao's Mistakes to identify politically the nature of his mistakes. Meanwhile, it still adopted the approach to uniting him in organization. When Zhang schemed to quit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arty, the major leader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went to great length to persuade him and win him back. However, when they perceived that he was determined to quit, they promptly made the Decision on the Termination of Zhang Guotao's Party Membership and the Brief Report on the Termination of Zhang Guotao's Party Membership" to clear up Zhang's mistakes in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Party and defuse th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military and Party. In this case, the Central Committee showed a change from "merciless struggle and ruthless crackdown" to "curing the sickness to save the patients" in dealing with the controversies in the Party, which set an example of adhering to principles while applying strategies in dealing with controversies in the Party.

Key Words: Long Marc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o Zedong; Zhang Guotao

(上接第104页)

On the Research and Studies into the Historic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Zunyi Conference Conducted in the Early 1980s

WANG Huail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cheng,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in the early 1980s, the Party History Materials Collection Committe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nducted a special research into the Zunyi Conference and concluded with a research report. The research was launched in the beginning of 1981 and had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n the initial stage, the investigators drafted a research report by reviewing source materials in archives, conducting field studies, and interviewing the people involved, which was circulated only internally. The research was also a process of collec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Chen Yun's manuscript provid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becam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is research and solved many puzzles about the conference. In the deepening stage, the research team polished and revised the draft report on the basis of further in-depth research and studies, confirming some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In the concluding stage, the research report, along with relevant literature, was published to the public, provid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Key Words: Zunyi Conference; research; Party History Materials Collection Committe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Chen Yun's manuscript